

前 言

托馬斯·曼說，*「在我們的時代，人類命運的涵義是通過政治語彙來昭示的。」在大學裏的許多學究看來，這當然是對的——那些冬烘先生們相信，一個人不管是在讀詩，還是在偷情，他必定同時也在表達一種政治觀點。以常識判斷，這一看法之荒謬並不下於認為「人類一切行為都是性表露」的那種庸俗化佛洛伊德觀點。葉芝†曾經這樣評論托馬斯·曼的話：

那姑娘在眼前亭亭玉立
甚麼古羅馬、俄羅斯
還有西班牙政治
我哪有心思讀下去？

這裏我們要把握的是常識。在政治中一切都是真實的，政治中討論的問題只有對或錯的分別(或多或少如此)。人們真的流血，真的死亡。政治艱難地支撐着一個平常的世界，我們可以在裏面彼此交談；而哲學

* 托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年)，德國作家。

† 葉芝(W. B. Yeats 1865–1939年)，愛爾蘭詩人。

家們則將人的經驗化解為觀念、眼界、知覺元素*、價值觀、主流、文化等等，他們將摧毀這個平常世界。政治是一種活動，它支撐着人類生活的框架；但政治並不等於生活。懷疑主義哲學家、道德相對論者、激憤的社會批評家、宗教理想主義者、富於幻想的預言家，這些人在我們的文明中都有自己的地位，但他們對政治的干預卻是一種不愉快的經歷，近兩個世紀以來尤其如此。經驗告訴我們，政治儘管能為生活的許多方面建立秩序，卻必須與上述領域保持一定距離。然而政治活動的確是一種濃縮的生活，充滿了英雄主義和爾虞我詐。要想了解政治就必須懂得，政治是隨着時間和地點的不同而千變萬化的。

本書是一部政治學導論，想在極短小的篇幅裏，既從學術也從歷史的角度來描述政治。本書試圖將政治活動的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討論，同時也要糾正一些錯誤觀念。然而筆者完全懂得：一種觀點在一個人看來是奇談怪論，卻可能被另一個人當作至理名言。

肯尼思·米諾格

1994年9月

* 知覺元素，英文為 *sensa*，是經驗主義學派使用的哲學名詞。這一學派認為，經感官獲得的知覺元素構成了人的認識。——本書隨文注釋為譯者注。

第一章

政治中為甚麼沒有專制者的位置

據說巴格達古王哈倫·拉施德* 常會喬裝成乞丐出宮訪察民情。聚集在絕對權力周圍的諂媚者們包圍着哈倫，他只有使用旁門左道才能了解到真實情況。哈倫就是那個著名的伊斯蘭國王，他宣佈將仙露薩德(Scheherazade)處死，可是仙露薩德會講好聽的故事，講了一夜又一夜，一共講了一千夜。哈倫聽得入迷，一再推遲執行死刑，最後竟娶她為王后。這著名的故事生動地描繪出專制體制的形象：那種政體的秩序靠武力來建立，以恐怖來維繫，朝令夕改，反覆無常。

在專制政體中，秩序的最高準則取決於君主個人的好惡。然而專制體制也不是完全不講正義的：正義在十分傳統的社會裏也普遍流行着——習俗主宰一切，人們把普遍流行的正義觀念當作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每個人都有一個神授的體系中佔有自己的位置。朝代的興衰更替遵循着中國人常說的「天命」，但對農民來說，生活並沒發生多大變化。君主的智慧主宰

* 哈倫·拉施德(Harun Al Raschid 766–809年)，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統治者，以殘暴和驕奢淫逸聞名。

一切。公元前十一世紀，以色列人和腓力斯人發生了衝突，以色列人便到統治他們的先知撒母耳那裏說，他們需要一個既能治理他們，又能帶領他們打仗的王。撒母耳不贊成這個要求，還警告他們說，這樣的王將會剝奪他們的財產，奴役他們的體魄。但以色列人仍然堅持要像別的民族一樣，立一個王。在當時的中東，「王」就是一個用專制的方式對待民眾的統治者，與歐洲立憲制下的統治者很不一樣。實際上，以色列人很幸運地擁立了索爾、大衛、所羅門這些著名的君王，他們使以色列人享有了一段短暫的安定，甚至為以色列贏得了一定的國際聲譽。所羅門對兩婦人爭奪同一嬰兒案的裁決* 只是他傳奇式智慧的一個最膾炙人口的例證。然而即使是這些賢明的君王也會採取暴虐的舉措，最後所羅門規模浩大的工程所帶來的沉重負擔終於導致了以色列的分裂。

「專制主義」是一個籠統的名稱，它包含許多不同的類型。非歐洲的各種文明幾乎全都不可避免地被不同形式的專制體制統治過，而西方的思想創造則總是遭到各種專制統治者的敵視——從殘暴的埃及法老到精神狂亂的羅馬君王如卡利古拉和尼祿，還有印度和中國那樣的遠方異邦的皇帝。在歐洲，追求專制權力的人必須把自己偽裝起來。歐洲人有時會被某種以誘人的理想主義面目出現的專制體制所蒙蔽——希特

* 《聖經·舊約·列王記》

勒和斯大林就使用過這種手法。這一事實提醒我們，專制主義的危險在時間和空間上離我們都不遠。許多國家至今還在專制主義統治之下，它隨時都可能帶來痛苦和死亡，人們就像生活在瘋人院裏。

今天我們將專制主義(連同專政和極權)定義為一種政體。這會使古希臘人大為驚駭，因為希臘人的獨特(也是他們的民族優越感)正是他們不同於那些聽任專制主義統治的東方鄰居。這一觀念上的差異告訴我們，政治在我們的文明中佔據着如此中心的地位，每當文化和環境發生變化，政治的含義也隨之變化。所以，我們研究政治的第一步就必須是擺脫現代固有觀念的窠臼。為甚麼最初曾是某些西方國家的精英所從事的一種有限的活動，如今竟被看作是無處不在的人類關注的焦點？寫作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解釋這一過程的來龍去脈。

首先要看一看古希臘人賦予政治的價值觀。希臘人最清楚地意識到，他們完全不同於東方人。希臘人讚賞埃及、波斯這些東方帝國的絢麗文化，卻又鄙視這些國度的統治方式。他們把這種外國制度稱作「專制主義」，因為這種體制下治理者與被治理者之間的關係無異於主人和奴隸的關係。希臘人是武士，他們鄙夷東方臣民在君主面前匍匐下拜：他們無法忍受公民與當權者之間這種不平等的關係。兩千多年後，我們完全繼承了這種對匍匐下拜的習慣性反感，部分的

原因是「匍匐下拜」是基督徒用來描述人與神之間的距離的一種意象。談論這類問題的時候我們常用 domination (支配) 這個拉丁詞。古希臘人說的 despotes (主人) 和古羅馬人說的 dominus (主人) 指的都是奴隸主所特有的那種權力。當代有許多語言符號表明人的這種難以泯滅的自我中心意識，例如現代英語中的 dictatorship (專政) 和二十世紀出現的 totalitarianism (極權)。

專制主義的本質是，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在法律上都不存在對統治者不受制衡的權力的挑戰。臣民的唯一任務就是獻媚。沒有國會，沒有反對黨，沒有不受政府控制的新聞界，沒有獨立的司法，法律無法保護私有財產不受強權剝奪。一句話，沒有公眾輿論，只有專制統治者的聲音。奇怪的是，臣民的這種被宰制狀態倒使一些專制體制成為精神啟蒙的著名發源地。在一個國度裏，強權的跋扈也會引發一種回應，富有思想的臣民轉向神秘主義、禁慾的斯多葛主義或是其他消極隱退的信仰。他們在超越感官的精神世界裏找到了生活的真蒂，而社會和政治生活則被貶低為一種幻象。這種趨勢的後果往往是科學技術的長期停滯，只有短暫的繁榮算是例外。

多數社會都起源於軍事征服，武力征服之後自然會產生專制制度，所以如果建立的是一種公民秩序或

政治秩序，就應當看作是了不起的成就。* 歐洲人曾在三個著名的歷史時期創建過這種秩序，但其中的兩次都以公民秩序崩潰而告終。第一次是古希臘的城邦時期，亞歷山大大帝去世後，專制統治者就攫取了政權。第二次是古羅馬時期，羅馬人成功地建立了一個帝國，但帝國的成份實在太龐雜，只有一個專制政權能防止它解體。第一次的經歷產生了斯多葛主義和其他的隱世哲學，第二次歷史經歷則為基督教播下了種子。中世紀型的政治產生於基督教和西方的原始國家，從中世紀政治又衍生出我們現代的政治制度。既然我們依舊生活在這樣的歷史進程中，就只好附在歷史的飛翼上旅行，我們不知道前進的終點究竟在何方。

然而我們的確知道，雖然反對專制曾是西方政治傳統的主要基石，但如今人們對專制的抵制已經變得曖昧起來。近幾個世紀以來許多人曾夢想運用專制政權所獨有的無法抵禦的力量來清除我們社會中明顯存在着的弊病。在歐洲，專制主義的政治方案，即使十分富有哲理和識見，也會遭到失敗，除非是把它真實本質掩蓋起來。既然政治在某種程度上只是一種舞台表演，人們就很容易發明出新名稱、新觀念。在

* 作者有意區分專制 (despotism) 和政治 (politics) 這兩個概念。政治專指以古希臘傳統為代表的治理方式，所以政治體制中不包括專制政體。因此，本章標題中說「政治中沒有專制者的位置」。實際上，本書中的「政治」一詞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政治即此章所說的與專制相對的政治，廣義的政治指所有的政治，專制主義自然也包括在內。

二十世紀以各種極權主義形式出現的專制體制構築了一個廣大的政治實驗場，各式各樣創建完美社會的政治設想都在這裏進行了演練。這些試驗都失敗了，這已經是大家公認的事實；但許多人卻沒有認識到，如此大規模的社會動盪必定與隱藏在我們文明深層的某些傾向相關聯。因此，要研究政治就不能不研究某些徵兆——它們或許能揭示我們文明中某一個斷層的深處隱藏着甚麼。

一個眾所周知的綫索就是衡量私人生活與公共領域之間的界限。私人領域指的是家庭生活以及個人良知的領域——個人良知即個人憑自己的意願選擇的信仰和興趣。這種私人領域存在的先決條件是：具有統治權威的國家公共領域支持一個維護公民自主關係的法制體系。具有統治權威的公共法律體制對自己的權力進行限定，唯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政治才能存在。正如伯里克利* 在紀念伯羅奔尼撒戰爭頭一年陣亡的雅典人葬禮上發表的著名演說中所說：「在私人生活中我們自由而且寬容；但在公共事務中我們嚴守法規。」當然，無論法律還是公民的態度，劃分公共事務和私人生活的實際界限總是在變化。同性戀和宗教信仰過去曾受到公共領域的規限，現在則基本上屬於私人領域；然而婚內強姦和殘害幼年子女卻越來越多地受到法律的干預。政治與專制的區別就在於是否承

* 伯里克利(Pericles 495 BC-429 BC)，古雅典政治家。

認公共領域與私人生活之間的界限——我們這裏說的政治可以粗略地稱作自由民主政治。

在古典的專制國家，社會中的一切都是專制主的私產，但現代社會「公」與「私」的界限卻被從另一個方向一步步侵蝕了：私人領域受到公共領域限制的部分在逐步擴大。如果任何引起爭議的問題都被稱作「政治」問題，如果像一個流行的口號說的那樣：「個人的一切都屬於政治」，那就沒有一樣東西是在政府控制的範圍之外了。這種口號並沒有得到普遍承認，然而它卻是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基本準則，其後果顯然是將個人限定在一個單一的控制體系之內，毀棄現代國家一直承繼着的傳統：經濟、宗教、文化、社會、法律等不同的角色相互獨立，各司其職。

「個人的一切都屬於政治」之類口號都是偽裝成真理的行動計劃。這類口號的意思常是模糊的，但口號中隱含的觀點一遇氣候便會活躍起來，要求實行與我們珍視的如個人自由之類價值觀相抵觸的政策。人們說，只有提高警覺才能保持自由，而警覺的一種重要形式就是留意政治語彙，這種語彙常能揭示事情的真相。

研究政治學首先就要注意變更的跡象。政治是一個幻覺舞台，粗心的觀察者看不出它的底細。現實與幻象是政治研究的兩個中心課題。首先碰到的問題就是政治制度和機構的名稱。目前世界上流行的主要是

西方政治模式，也就是說，每個國家都有一種政治體制，還有一套相應的機構和制度：議會、憲法、公民的各種權利、工會、法庭、報紙、部長，等等一看起來全世界的政治都在按照同一種模式運行。事實卻絕非如此。比如說，日本有一名被稱作首相的政府官員，外國政治家就常鬧誤會，他們會很失望地發現，日本首相從不能像其他國家的首腦那樣頒佈國家政策。1936年斯大林頒佈了據說是全世界最先進的憲法，為蘇維埃公民提供了大量權益和保障。但事實上就在頒佈這部憲法的同時，斯大林正在用假審判的手段對蘇聯高層人士進行「清洗」。成百萬的臣民被槍決。政客愛撒謊，這已經不是甚麼秘密，但最讓世人迷惑的卻是名稱與現實之間的這種撲朔迷離的關係。

首先，「政治」這個名詞本身就含義曖昧。一個概念如果過份地延伸就會斷裂而失去作用。「政治」本來只指君主、國會、部長們的活動，還包括那些幫助或阻礙這些人物取得權力的政治參與者的活動。除此之外的一切活動都屬於社會生活或是私人生活的範疇。隨着政府權力的擴張，幾乎所有的東西都被以某種方式貼上了「政治」的標籤。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很多，這裏僅舉一例：政府總是要把一切好事都歸功於自己，反對黨則總是要把一切壞事的賬都算到政府頭上，於是政府和反對黨就在合力傳播着一個觀念：一切事情，不管好事還是壞事，都是政策造成的。這

種觀念使得臣民們遇事就去向政府請願，似乎一切利益都可以由政府來施捨。這種做法又反過來加強了「一切事物都是政治」的觀點。

還有一個因素導致政治的功用和涵義被無限擴大。在歐洲，從遠古以來政治就一直是君主和大臣們從事的活動，歷史主要描述的是他們的業績。參與政治就等於獲得了永生。1952年菲德爾·卡斯特羅在古巴第一次奪取政權失敗，在法庭上他為自己辯護說：「歷史將宣判我無罪。」他把自己看作一個歷史舞台上的演員。凡欲垂名青史的人都會去從政。本可能成為克倫威爾*的人們由於命運的安排「未能在疆場上馳騁廝殺」，他們再也不甘願默默無聞地老死在寧靜的鄉村墓地。†他們要去從政。法國革命將這種榮譽帶給了本該默默無聞的人物如羅伯斯庇爾、丹東、馬拉、夏洛特·科爾代、聖鞠斯特等。革命者是往歷史上胡塗亂抹的藝術家。這是極端的例子，而在多數情況下這種希望不朽的熱情以較為溫和的形式在人人可投一票的普選中得到了滿足。普選當然是一種通貨膨脹，它使選票貶了值，但我們仍然認為選舉是一個體面公民享有的重要權利。「艾利絲在歷史上留下了痕

* 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 1599–1658年)，曾領軍推翻英王查理一世的統治，成為共和國的首腦，稱「護國公」。

† 作者引自著名英國詩人托馬斯·格雷(Thomas Gray 1716–1771年)的抒情詩《墓園輓歌》。原句大意為「這裏或許安息着：某一個未能揚名文壇的密爾頓/某一個未能征戰疆場的克倫威爾」。

跡」——這是英國報紙的一條大標題，報道一位南非黑人婦女1994年第一次投票的情況。

我們現代人(尤其是那些自認為生活在後現代的人們)特別容易對政治的本質產生誤解：我們想出了種種巧妙的理由來證明我們的思想比我們的祖先高明得多。所有的文化都認為唯有自己信奉的觀念最正確，然而今日受過教育的人們尤其無法擺脫當代各種偏見的束縛。比如說，進化的觀點，就使許多人認為，我們的思想都比前人的那些當然有缺陷的觀點更偉大。當代流行的思潮的確否定了進化的觀點，並明確指出我們的觀念帶有濃厚的本時代和本地域的烙印；它還認為每一種文化都是平等的。表面看來，這種思潮像是一種懷疑主義，將我們從自己祖輩的傲慢中解放出來，因為它好像是把我們的觀點降到了與世界上其他人同等的水平。這其實只是一種假象。當代流行的懷疑主義是一種虛偽的恭謙，它掩蓋了這樣的一個頑固的信念：我們的開放心態使我們的相對主義人文觀(realist humanism)比前人的僵化和異族文化的褊狹都要高明得多。

因此，撰寫政治學著作的人必須警惕自己所處時代的狹隘偏見。在當代這種危險性決不低於往昔。人們廣泛地意識到這種危險性，所以政治學一直是文科教學中的一門主課。希臘和羅馬貴族學習法律、哲學、公共講演術，以便完成血統高貴者才配承擔的政

治使命。政治成了一門核心課程，是因為它很快就變成一種自覺的活動。政治活動促使人思索，並產生出一批極優秀的著述。哲學家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探索過政治的概念；歷史學家如希羅多德生動地記載了政治演進的過程；政治學家如亞里士多德研究過各種政體以及政治制度運作的情況；伊索將政治智慧用寓言表達出來；著名的演說家如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羅創造了最有說服力的論辯形式；詩人寫作政治題材的哀歌和諷刺詩，而歷史事件中的政治場景最能激發莎士比亞等戲劇家的靈感。沒有一種人文學科或藝術創作從不涉及政治題材。

許多學術和藝術作品都是政治的鏡子，只有把那些意象拼配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認知體系，我們才能把握它們的真諦。我們從急功近利的政治家和清高超脫的學究們那裏都能學到不少東西，應當把對二者的研究結合起來。馬基雅維里* 追尋政治的「有效真理」(effective truth)，那只不過是為政治活動家服務的。「有效真理」有許多疏漏。我們必須從我們政治概念的奠基者——古希臘和羅馬人那裏開始，先討論一下他們的各種不同觀點。

* 馬基雅維里(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年)，意大利政治家。

第二章

古希臘人：怎樣做一個公民

對於古代希臘人來說，政治是一種新的思想方式，新的感覺方式，尤其是一種新的人與人的關係。公民們在財產、容貌、智力方面各不相同，但作為公民他們都是平等的。這是因為公民們都是理性的人，而理性人類間唯一合理的關係就是說服。說服與命令的不同之處是，前者認為講話的人和聽話的人處在平等的地位。柏拉圖在他的對話錄《克里托篇》(Crito)中對這種政治生活形式作了精采的描述。哲學家蘇格拉底因腐蝕青年罪被判死刑，有人要幫他逃離雅典，他拒絕了。蘇格拉底說，逃跑就意味着在理性上背離他用畢生行為來表達的他對雅典城的忠誠。甚至行刑的方式也反映了一個基本信念：暴力不是處理公民間關係的妥善方法——他被准許飲毒自盡。希臘人自願地遵守他的雅典「城邦」(polis)的法律，而且以此為榮。蘇格拉底本人的存在與他的雅典城邦不可分離。最糟糕的命運是放逐，那是一種對公民身份的剝奪，通過「貝殼放逐法」* 將公民們認為對雅

* 貝殼放逐法(ostracism)，古希臘通過公民用貝殼或陶片投票的方式決